

东南亚民族志丛书

何明◎主编

流动的橡胶

中老边境地区两个哈尼/阿卡人村寨
的经济交往研究



Mobility of Rubber Plantation:

A Study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Hani/Akha Villages
on the Sino-Laos Border

马翀炜 张雨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南亚民族志丛书

何明◎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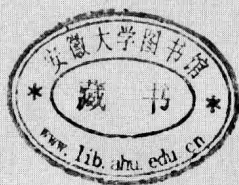
流动的橡胶

中老边境地区两个哈尼/阿卡人村寨
的经济交往研究

Mobility of Rubber Plantation:

A Study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Hani/Akha Villages
on the Sino-Laos Border

马翀炜 张雨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动的橡胶:中老边境地区两个哈尼/阿卡人村寨的经济交往研究 / 马翀炜, 张雨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161 - 3090 - 2

I. ①流… II. ①马…②张… III. ①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国、老挝
IV. ①F127②F133. 3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223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25
插 页 2
字 数 203 千字
定 价 46.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迈向异国田野,解读他者文化

2007年下半年,我制订了开展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计划。两年多来,先后到泰国、缅甸、越南等国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洽谈合作,多次向高丙中、王铭铭、麻国庆、袁同凯等专家讨教,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有志于此项工作的诸位同人反复讨论,还于2008年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塚田诚之教授在云南昆明合作召开了“中国边境民族的跨境流动与文化动态”研讨会,2009年11月赴日本与塚田诚之、长谷川清、松本真澄、片岗树等日本学者研讨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族研究问题。经过校内外30多位师生的共同努力,《东南亚民族志丛书》今天终于面世了。

在此,我把组织与推进东南亚研究的基本构想和实施体会作粗略介绍。

一 实践与学术:国外民族志研究的价值

许多学科都参与了国外研究,如归属于经济学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归属于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归属于史学的世界史和国别史、归属于文学的外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等。这些学科都运用其学科的理论方法对特殊领域或问题开展了国外研究,换言之,研究国外的学科、方法及其学术文本和路径是多种多样的。

人类学/民族学如何开展国外研究呢?当然方法和文本也是多样的,可以采用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通常的文献研究方法研究世界民族

问题和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但作为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手段和以民族志为学术核心产品的学科，人类学/民族学的国外研究必然需要到国外做田野调查并撰写民族志。

民族志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社会文化的方法和学术文本。作为研究方法，研究者必须到国外去，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参与观察，以切身体验理解其社会文化、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作为学术文本，民族志既不是对国外社会文化进行概括性的宏观评介和抽象性的理论分析，也不是非学术性的国外民俗风情的表层描述和感性评议，而是以特定群体或区域为边界对其社会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描述与分析，进而呈现与解释特定群体或区域的社会文化的运行逻辑和特征。

因而，民族志的国外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学术文本还是研究内容，与其他学科和方法的国外研究具有明显的差异，也不能为其他学科和方法的研究所取代。其间的差异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直接与间接的区别。民族志研究需要研究者“到国外去”与其研究对象直接接触并深入其社会生活之中，切身感受、体验其社会文化过程，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获取主要的研究资料；其他学科和方法则可以主要通过文献资料开展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具有间接性。二是微观与宏观的区别。民族志研究的常规方法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选择小型社区或特殊群体作为研究焦点，也就是说，要设定出研究对象的空间边界和社会边界；其他学科和方法的研究则可以不进行空间边界或社会边界的明确界定，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大区域开展整体性研究。三是具体与抽象的区别。民族志文本大都包含了有关研究对象的大量事件、人物和细节及其过程的叙事，有的民族志甚至选择了小说式的叙事模式，研究性的分析与解释融汇于或结合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运作过程之中；其他学科和方法的研究成果则主要采取“论证”或“论述”的模式，极少对研究对象进行详尽的叙事，呈现给读者的主要是研究者的分析论述过程，而不是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过程。四是主位与客位的区别。民族志研究特别强调从研究对象出发的“主位”视角，力求阐释研究对象如何体验、思考与评价；其他学科和方法并不特别强调研究对象的视角，更多的是从研究者的“客

位”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占主导的是作者的“我认为”而不是研究对象的“他（们）认为”。此外，民族志研究还具有关注“底层”或“平凡”、研究对象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等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国外或世界研究中，民族志是不可或缺的，它与其他学科和方法的研究形成了相互补充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人类学/民族学的国外研究是最薄弱的。其他学科都有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西方哲学、世界史、欧美文学等专门研究国外的分支学科，反而以“异文化”研究为特色、因研究“异文化”而创建学科的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学界却极少对国外进行民族志研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创建之时正值我国处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织的时期，救亡图存是中国人最迫切的使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研究国外特别是欧美最根本的目的，借助西方的思想、模式、方法以及学科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无疑是那个时期的“主旋律”，人们无暇也无力关注与解决本国问题并无直接补益的国外社会文化。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被奉为楷模的大师在国外求学时没有沿着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常规路径调查研究“异文化”，而选择了研究“本文化”，以家乡民族志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并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经典。他们的这一选择，既迎合了其导师研究“异文化”特别是研究历史悠久的中国的学术志趣，也满足了作为那一代学者的社会理想。“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所奠定的学术传统对中国内地人类学/民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乡民族志”成为国内诸多学者的选择和人类学/民族学的特色，“异文化”或“异国文化”研究失去了引路人。20世纪50—70年代的“闭关锁国”制度选择扼杀了中国人向外看和到国外去的欲求与实践。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激活了与国家制度转型和社会实践直接相关学科的国外研究，而那些不能“立竿见影”地直接解决制度创新、经济增长、技术改进等问题的研究领域则只能“画地为牢”地做国内研究，需要“到国外去”做田野调查的经费支持和制度支持的民族志研究则几乎成为“天方夜谭”而无人染指。

进入21世纪，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跃

居世界前列，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性经济、社会、政治体系之中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大国崛起”梦想逐渐变成了现实。同时，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经历了“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努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为频繁、更为密切、更为深入，激发出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强烈诉求，而且这一诉求呈现出从有什么向为什么、从表层（如国外旅游）到深层、由鸟瞰到细察的演进。国外民族志研究便是应当下中国之运而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其所生产的知识满足的就是中国了解世界新阶段的需求。

从人类学/民族学本身来看，“异文化”或“异国”研究是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国内研究和整个学科的建设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放眼世界，凡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强国（如欧美和邻国日本），无不重视与开展了国外民族志研究，无不积累了丰富并高水平的民族志成果。

无论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来看，还是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来看，国外民族志研究都是非常必要且迫切的。

二 以跨国流动为主线的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依据与意义

“东南亚”指亚洲的东南部地区，包括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 10 个国家。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中国人以“南洋”、“东西洋”或“南海”称之，西方则用“远印度”、“外印度”或“印度群岛”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军队设立了“东南亚最高统帅部”以指挥这一区域的战争，“东南亚”一词逐渐被广泛接受，并成为指称这一区域的通用称谓。

对东南亚进行以跨国流动为主线的民族志研究，既有自然的基础也有社会的基础；既有历史事实的依据又有社会现实的依据；既有学术探讨的目的也有实践应用的目的。

从地理角度来看，东南亚东临太平洋，南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

西濒印度洋，南、北分别与“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孟加拉国）、中国接壤，是亚洲、非洲、大洋洲三大洲的交汇地区和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的交通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亚洲和澳洲两个次大陆的人种、族群、文化以及动植物在这一地区交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格局和自然生态景观。东南亚与中国毗邻，其中越南、缅甸、老挝三国与中国接壤。山水相连的地缘关系把中国与东南亚天然地连为一体，为历史与现实的频繁交往提供了自然条件的便利。

从历史角度来看，作为地处亚洲、非洲、大洋洲三大洲交汇位置和通往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的枢纽，东南亚成为历史上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站”和必经通道，先辈们通过“over land”和“over sea”两种方式来到东南亚，或驻足于此创业发展、繁衍子孙，或途经此地后继续前行。在东南亚，无数中华儿女“下南洋”、闯世界的足迹举目即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事件途经东南亚多个国家并且在所经之地产生的深远的影响至今犹存。他们把中华文化和技术传播到东南亚，又把东南亚人民的思想智慧带回中国，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发展，定居于东南亚各国的 2000 多万华人成为东南亚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族群关系来看，东南亚半岛与中国西南为族群迁徙与互动的走廊，形成了许多跨国民族和亲缘民族。在历史上，诸多族群沿着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红河等河流从中国南下定居到东南亚，如从中国湖南、贵州、云南迁入东南亚的“蒙”（苗族）、从中国西双版纳迁入东南亚的泰族支系“泰勒”等；也有东南亚半岛族群北上定居在中国西南边境一带“老缅人”等。泰族、越族、佬族、掸族、岱（岱依）族、芒族等东南亚民族与中国的壮族、傣族、布依族等同属“百越”后裔；母瑟族、傈族、傈傈族、克钦族、阿卡族、拉瓦族等东南亚民族与中国的彝族、哈尼族、傈傈族、纳西族、拉祜族等民族共同渊源于古代的“氐羌”。在语言上，东南亚半岛国家民族语言主要包括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划分有争议）、孟高棉语族、印度尼西亚语族、马六甲语族五大语族，其中，东南亚的傈、傈傈、阿卡、母瑟、拉瓦、拉祜等与中国的彝、傈傈、哈尼、拉祜、纳西、基诺等民族的语言同属藏缅语族彝族支；东南亚的缅族与中国的

阿昌族的语言归属于藏缅语族缅语支；东南亚的泰、掸等民族与中国的壮、傣、侗等民族的语言同属于侗台语族（又称壮侗语族）；东南亚的蒙、瑶等民族与中国的苗、瑶等民族的语言共同归属苗瑶语族；东南亚的越、崩龙、阿佤等民族与中国的佤、德昂、布朗等民族的语言同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前，东南亚与中国西南为族群流动、迁徙与融合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后，尽管受到国家的阻止和国界的限制，族群的跨国流动仍然以不同的方式频繁发生着，如跨国通婚和迁徙等人口流动、物质交换和经济流动、互访等文化流动，等等。总之，东南亚与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和多重交织的交流互动及其所形成的动人心魄的文化动态为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出了魅力无穷和数不胜数的研究论题，也为许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文化传播、社会变迁、民族或族群与国家关系等学术悬案和理论难题的解决或重新解释提供了丰富有力的资源。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与社会文化交流的不断密切提出了开展东南亚国家民族志研究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呈现迅速上升趋势。近年来，在东南亚的对外贸易中，中国排第四位；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东南亚处于第五位。东南亚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之一。2002年11月，中国与由东南亚十国组成的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协调合作的区域性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即“10+1”正式形成，这是继欧盟（European Union）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后建立的世界第三大区域性经济合作区。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正式生效，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相互开放市场、建立密切关系、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全面启动，各国通过相互取消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开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实现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等措施推动区域合作与联系登上新台阶。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

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社会互动与文化接触的频繁与深化。在这一背景下，运用民族志方法对东盟国家进行研究，无疑对消除文化误解、增进互相理解、推动和谐交往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三 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困境

在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试验与推进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开展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但同时我也切身体味到其难度和困境。

困境之一来自政治体制和社会模式等客观方面的制约。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体制差异巨大，其中一些国家对于外国人在其国内的活动实施程度不等的管制、限制和监控。作为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作为最基本调查方法的民族志研究，进入东南亚国家的基层社会做田野调查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诸多困难。

困境之二来自研究者队伍学术准备不足的主观方面的制约。中国的许多东南亚研究依靠的是英文等文献，而不是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语言，其所提供的信息大都比较笼统，对于深入小型社区开展田野调查来说远远不够。东南亚各国的语言在中国都纳入“小语种”的范围，普及面非常有限，掌握者寥寥无几，况且对于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学者来说，不仅要掌握研究对象的语言，而且还需要掌握研究对象所在国的官方语言，在目前情况下两者兼备者几乎无处寻觅。

为此，我必须坦诚地告知读者，《东南亚民族志丛书》是在上述条件下完成的，必定存在诸多缺陷甚至谬误，因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而导致田野调查不够深入细致、文化解释不够准确透彻则是本套丛书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我信奉的做事原则是：有胜于无，先有后好，敲门需砖。因为包括东南亚民族志研究在内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相信，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东南亚国家的整体开放程度将不断扩大，而随着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推进，一批具备从事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学术队伍也将逐渐成长起来。到那时，堪称为“玉”的东南亚民族志研究作品就会涌现出来，本

套书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我真诚希望，有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入到东南亚及其他区域、其他国家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队伍中来，因为这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也是一个极具魅力和挑战的研究领域！

何 明

2012 年 3 月

引 言

中国国防村与老挝坝枯村是中国老挝边境地区相邻的两个哈尼/阿卡人^①村寨。国防村全称国防村民小组，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捧镇曼回庄村委会。国防村西距中老边界第42号界碑（1992年立）2公里，是一个哈尼/阿卡人村寨，截至2010年1月，有147户628人。在中老边界第42号界碑的西侧4公里处则是老挝坝枯村，隶属于老挝琅南塔省勐新县，是一个阿卡人村寨，有90户460人。两个哈尼/阿卡人村寨，拥有相同的族源和相近的迁徙历史，也拥有基本相同的文化。长期以来，相邻而居的两个村寨社会交往密切。

描述这两个村寨的风土人情，介绍这两个村寨橡胶经济的发展过程以及记录许多正在消失的仪式活动等都有意义。事实上，这方面的内容都会后面的文字中得到一定的展现。但是，如果是仅限于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那就可以一个村一个寨地单独进行。之所以将这两个相邻的哈尼/阿卡人村寨同时纳入考察的视野，就是由于两村之间有一条国境线。国境线的存在使相距仅几公里的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村寨分属不同的国家，同时观察这两个村寨就不仅可以使我们同时考察哈尼/阿卡人的传统文化以及现代社会变迁过程，而且还可以使

^① 在中国，阿卡人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雅尼支），主要分布于西双版纳州、普洱市澜沧县、孟连县等地。在老挝、缅甸、泰国等国家，阿卡人也被称为阿卡族。国际学术界通常把中国的哈尼族和这些国家中的阿卡人合称为“哈尼/阿卡人”。

我们在对每一个问题进行观察与思考的时候都能意识到国家的存在。这一视野能够使我们较为直观地而不是抽象地发现国家在现代世界中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视野能够使我们对于跨境而居民族的基于传统文化的民族认同问题以及分属不同国家的处于不同的国家化进程中的，即相应地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新的建设变化中的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以及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基于此认识，我们首先对分属两个国家的两个村寨的历史沿革、村寨组织、基础设施以及教育与医疗卫生等基本情况进行概述，描述橡胶经济发展以来，这两个村寨在土地制度、生活方式以及经营模式等的经济变迁过程，呈现两村村民合作开发橡胶种植所带来的树的流动、技术的流动、产品的流动以及人员的流动等各种跨境流动现象，并考察由橡胶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以及岁时节日等所造成的影响，最后聚焦于橡胶经济发展条件下跨境而居的哈尼/阿卡人的身份认同等问题。

近十余年来，随着橡胶种植在这一地区的推广，经济交往关系迅速上升为两个哈尼/阿卡人村寨之间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在改变两个村的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两村村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观念，并反过来又对他们的社会交往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即遭到了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封锁。为了突破封锁，解决国防战略物资短缺等问题，新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工业，而橡胶则是必需的工业原料之一。于是找到合适的地方种植天然橡胶成为紧迫的任务。地处亚热带地区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具备低纬度、低海拔、强光照、强热量等橡胶种植的条件，在国家的大力开发下，迅速成为中国橡胶种植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地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各种政策，努力发展地方经济，并且将发展地方经济作为工作的重心。20世纪80年代初，西双版纳当地政府开展了林业“三定”工作，并实施由农民自己管理的“两山一地”政策。1985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政府将橡胶种植作为村民“增百致富”的具体措施强力推行。这一年，政府专门派技术员到国防村等民

族村寨指导农民种植橡胶，同时向村民提供低价的橡胶苗，并在后期对胶农进行橡胶种植技术、管理知识以及割胶技术等内容的培训。这些举措引导少数民族村寨进入了橡胶种植业，橡胶从国营农场走进了国防村等少数民族村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橡胶市场上的生胶价格不断上涨，村农们逐渐认识到了种植橡胶的巨大收益，橡胶种植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种植面积开始逐步扩大。到1993年国防村的第一批胶林开始割胶，期望变为了现实。发展橡胶也契合了村民发展经济的内在需要，橡胶经济成为少数民族村寨的支柱产业。这既是国家意志的具体表达，又是市场激励的生动体现。

进入21世纪，橡胶经济的发展更加迅猛。从橡胶价格上看，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国际橡胶市场的生胶价格上涨了近10倍，这也使得橡胶种植的冲动变得不可遏制。西双版纳地区的橡胶种植面积已经超过300多万亩，曾经茂密的热带雨林被绿油油的橡胶林代替，林权改革的进一步完善使林地权属更加明晰，诸如国防村这样的山村已经没有更多的土地种植橡胶。于是，受到巨大经济利益刺激而产生强烈的种植橡胶的冲动的胶农们开始走出国门，进入老挝边境地区，与老挝的坝枯村等地的村民合作种植橡胶。2003年，中国国防村村民开始跨境与老挝的坝枯村阿卡人村民合作种植橡胶，截止到2010年1月，已经有100多户国防村村民通过各种形式与坝枯村村民合作种植橡胶。

可以说，中国国防村村民跨越国境线到老挝坝枯村合作种植橡胶是市场经济刺激的结果，但是这种合作的成功也与更大的国际环境以及老挝的国家发展政策有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老挝政府开始推行绿色禁毒的“替代种植”行动。老挝坝枯村所在的老挝北部地区过去是毒品原料罂粟的种植区，也是毒品危害的重灾区。在这一地区推行“替代种植”是老挝政府和当地民众的愿望所在。中老两国政府的积极合作使中国的杂交水稻、甘蔗、橡胶等植物成为老挝实施“替代种植”的重要作物。中国国防村村民与老挝坝枯村村民合作种植橡胶可以说也是“替代种植”的具体行动，自然也得到了中老两国政府的支持。

除了国家力量的主导和市场经济的刺激外,以相同的文化为基点的民族认同也推动了跨境合作种植橡胶活动的开展。国防村与坝枯村的村民同属哈尼/阿卡人,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都是相同的。这些共同之处使得两个村寨间的国境线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频繁往来,如跨国婚姻、生产合作、节日往来等都是人们的重要交往方式。而老挝坝枯村的土地上首先出现的橡胶也是由7户从中国返回的难民种植的。由于老挝国内的战乱,这几户阿卡村民于1979年逃到中国国防村,1997年返回老挝国内。在中国国防村生活的近20年间,7户难民同国防村其他村民一样分到土地种植了橡胶,并从橡胶种植中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也掌握了橡胶种植的基本技能。回到老挝后,这7户原先的难民率先种植了橡胶。

中国国防村和老挝坝枯村这两个属于不同国家的村寨间的经济交往关系,则因为开展跨境合作种植橡胶的活动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人们将更多的精力与时间都投入到跨境合作种植橡胶的活动中,橡胶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大,坝枯村的橡胶面积从1998年的450亩增加到2009年的30500亩,而这些橡胶绝大部分是在2003年之后的跨境合作种植行动中种植的。中国国防村在跨境合作种植活动中,有100多户与老挝坝枯村80多户村民建立合作关系,并按规定比例从中分到共计7500亩橡胶林,老挝坝枯村村民则分到12000亩橡胶林,这也就意味着按照合同中国国防村在老挝坝枯村的土地上拥有7500亩橡胶林的产权。合作种植橡胶使更加频繁、更加复杂的经济交往活动成为两村村民间最为重要的一种交往形式。

成为主导产业的橡胶种植业改变了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同时也对当地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橡胶种植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生计模式,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结构,使新的土地使用制度得以生产。橡胶种植活动使得树的流动、技术的流动、产品的流动以及人员的流动等各种跨境流动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节日文化、婚姻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变化。随着建立在跨境合作种植橡胶活动上的经济交往程度的加深,中国国防村和老挝坝枯村村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等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拉比诺在他的民族志著作《摩洛哥田野作用反思》一书的引言中说过，他的书“浓缩了对众多人物、地点和感情的研究，它可以用现在一半的篇幅来写，也可以用两倍或者十倍的篇幅来写”^①。确实，在田野调查中收集的材料往往都很庞杂，选择什么材料来用是十分考人的，这主要与作者想表达的主题有关。主题的确定往往又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就是在写作过程中，对材料的理解也都可能不断发生变化。这样，写作的过程也还是确定主题的过程。本书前两稿的篇幅曾是现在的两倍。最后压缩掉了大量的有关传统仪式活动的内容，这可真有点“浪费的人类学”的味道了。好在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哈尼/阿卡人的研究还会继续，也许将来会以其他的方式去把删掉的东西捡回来，努力做到不浪费。删掉一半的内容是为了突出我们现在想突出的重点。比方说，剪裁之后的这些东西可能会让我们更多地反思国家的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否总是会失败的问题。诚如斯科特所指出的，不了解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乃至滥用国家权力来重新塑造整个社会必然会导致失败。^② 但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项目也有许多是成功的。并且，对某些发展项目是否算得上成功的看法难以完全一致（当然也没有必要完全一致），其原因在于就连对什么是“成功”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这是西方学人爱说的话。这话黑格尔说过，很多人说过，拉比诺也说了一次。但中国老师教育学生时更喜欢说的是“笨鸟先飞”。现在看来，“先飞”绝对算不上，“笨鸟”倒是算得上的。没说大家，我们说的就是写作本书的我们。为什么？看了就知道。

① [美]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页。

② [美] 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目 录

引言	(1)
----------	-----

一 概况篇

第一章 历史沿革	(3)
第二章 村寨组织	(15)
第三章 基础设施	(19)
第四章 教育与医疗卫生	(25)

二 经济篇

第五章 土地制度	(39)
第六章 生计方式	(49)
第七章 经营模式	(66)

三 流动篇

第八章 树的流动	(77)
第九章 技术的流动	(92)
第十章 产品的流动	(97)